

中国改革开放 与世界变局中的大国战略

田国强

(上海财经大学 高等研究院, 上海 200433)

摘要: 过去 70 年来, 中国经历了建设和改革的发展变迁, 特别是 1978 年以来, 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空前的成就。总结其原因, 除了继续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之外, 在保障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的基础上, 出现了新的要素, 即较大程度的经济选择自由、松绑方式的改革、引入了竞争机制和实行了对外开放等。面对中美关系和世界格局出现深刻变化的历史情境, 中国需要深化改革, 扩大开放。进入新时期, 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创造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等正成为开放体系下全球经济贸易、投资的目标和重点, 也是中国下一步改革开放的努力方向。

关键词: 改革开放; 市场; 政府; 民营企业; 竞争中性; 知识产权保护

中图分类号: F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0246 (2019) 12-0060-07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举世瞩目的变化, 成功让 7 亿左右人口摆脱了贫困, 诸多经济指标已经跃居世界前列, 从 GDP 总量看,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此过程中, 中国从原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初步实现了向分散决策、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 非国有经济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不过, 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问题依然突出, 发展的创新性、协调性、生态性、开放性、共享性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欠缺。中国要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实现向高收入经济体的跃升, 必须矫正经济发展模式中的制度弊端, 推动经济实现平衡、充分、良性发展, 而这仍需要进一步的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的发展历程, 笔者认为既有经验也有教训。近些年笔者归纳总结了“三维六性”的研究和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方法, 只有通过“理论逻辑、实践真知、历史视野”这三个维度, 才能保证结论和举措具有“科学性、严谨性、现实性、针对性、前瞻性、思想性”。之所以强调“三维六性”的方法, 是因为目前部分对改革经验教训的总结、提出的政策建议和改革措施缺乏科学性、严谨性。本文主要谈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到底是哪些因素, 特别是新的因素使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人类历史上举世瞩目的成就; 二是中美大国关系发生的深刻变化; 三是世界新变局下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必要性。

一、改革开放的逻辑起点与新的要素

做任何事情、分析解决问题, 必须明道, 也就是明了做事的基本规律、道理和原则, 包括改革。经济问题之所以难解决、改革之所以容易引起争议, 是因为未将两大最基本而无法改变的客观现实作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逻辑起点: 一是个体的利益, 也就是个体的逐利性。在通常的情况下个体总是考

作者简介: 田国强, 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教授, 研究方向: 经济理论、机制设计理论、数理经济学、中国经济、转轨经济学。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虑自身利益，这也是现代经济学基石性假设的逻辑出发点；二是信息不对称问题，在绝大多数情形下，经济人之间往往信息分散、不对称。承不承认、能不能应对好这两个最大的客观现实约束条件，是避免争论和政策失败、不断提高效率和创新力的关键。于是，如何应对这两个客观现实，采用什么样的“游戏规则”（制度、激励机制和政策）成为经济学最关心的问题。这也是中国下一步改革的基本逻辑出发点。由此制度的选择或制定就显得至关重要，但制度的制定并不是要改变人性，个体的逐利性是改变不了的。好的制度本质是稳定个体之间的信息交换过程，减少其间产生的不确定性和激励扭曲，达到合意的目标。^①改革的实质就是把人性作为基本的约束条件来设计制度、激励机制和政策，顺应人性，让人们自愿地改变行为结果，实现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的激励相容。

计划经济在百废待兴、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新中国的工业体系，使国民经济恢复发展，为改革开放奠定了经济基础。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计划经济不能适应新发展形势，需要逐步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计划经济时期，政府以高度集中的计划手段从数量和价格方面干预经济活动，但这并不是建立在完全信息基础上的，而是以经济主体的偏好、资源禀赋、技术水平等多方面信息为依据，往往信息的虚假程度较高。

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就是充分认识到上述两个客观条件。实质上，对这两个客观现实条件的认识，也一直是笔者与林毅夫教授辩论的内在本质焦点，即“事事有为”的政府与“有能、有为、有效、有爱”的有限政府的争论，但有为政府不等于有为的政府。在笔者关于有限政府的界定中，“有能”指政府执行力，“有为”是政府在应该作为的领域（主要是维护和服务）不缺位，“有效”是政府行政管理的效能和效率，“有能、有为、有效”主要指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有爱”指处理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和“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简政放权，创新监管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②说明应当提升经济包容性、国家强制力（依法治国）、政府执行力及社会包容和谐性，政府应回归维护和服务的基本职能。^③

“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简政放权，创新监管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意味着要从行政干预过多的全能政府向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的维护性有限政府转变，让企业、社会组织和中介机构承接政府转移的职能，减少直至消除政府角色“越位”和“错位”的现象，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让政府在维护社会稳定和市场秩序、保护产权和合同严格执行等方面发挥作用。“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意味着向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包容型政府转变。政府要最大限度地缩小经济人角色，扩大公共服务的范围和力度，弥补直至消除政府角色“缺位”的现象。在公共服务的经济维度方面，政府要为企业创造良好的经济社会环境，提供经济发展所需的软硬件基础设施；在公共服务的社会维度方面，政府要通过转移支付和财政手段支持教育、科技、文化、社会保障、公共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等社会发展项目，为全体公民参与市场竞争创造相对公平的起点。^④

需要指出的是，执行力既包括政府层面依法治国的刚性执行力，也包括人性化激励相容的柔性执行力。不能只强调前者忽视后者，具有激励相容的包容性经济制度和具有依法治国能力的权威政府制度是国家良性发展和成功的必要条件。^⑤柔性执行力与个体逐利、信息不对称这两大客观现实息息相关，因此，政府在制定政策和制度时需要注意三个异常重要的关键词，也是前面对计划经济的分析中

① 田国强、陈旭东 《制度的本质、变迁与选择——赫维茨制度经济思想诠释及其现实意义》，《学术月刊》2018年第1期。

②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

③ 田国强 《改革开放40年再思考：平衡充分良性发展的制度逻辑》，《比较》2017年第6期。

④ 田国强、陈旭东 《论中国深化改革面临的四个转变》，《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

⑤ 田国强 《十九大与全面深化改革的新使命、新任务》，《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8年第2期。

论及的几大关键词：一是信息有效性，由于信息分散、非完全及不对称，人们希望采用分散化决策的市场制度，进行松绑放权的改革，以此提高信息效率；二是激励相容性，让他人、个体即使在逐利时，客观上也做了社会想做的事情。个体能否做好某件事情，关键看是否能够做好激励。是否形成激励相容的关键则取决于制度设计的好坏，“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①；三是资源配置有效性，在资源给定的情形下，没有再改进的余地。资源配置是否有效与激励、信息有关，低效的制度常常与激励不相容、信息成本过高联系在一起。市场制度在解决这三个要求方面具有天然、独特的优势。

中国过去40余年的改革开放如何应对个体的逐利性与信息的不对称性？哪些新的因素促进中国经济实现了规模空前的大发展？这就需要寻找除了党的领导、国有企业的作用、政府的主导之外的新要素。笔者认为，科学的本质内涵就是可控的实验。在总结改革开放成功的因素时，也应按照科学的本质内涵——控制实验的基本方法论来谈什么是差异因素，不能将所有的因素都放在一起泛泛而谈。在经济学中也存在以“其他条件不变”的假设来着重研究某两个变量或一组变量之间的内在关系，尤其是实验经济学和市场设计等“经济工程学”的发展，彰显了经济学的科学属性。

改革开放前后几十年的对比，就做了一次很好的实验。因为很多重要的、必要的因素：党的领导、政治和社会的稳定，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一直坚持和保持的。国有企业的作用和政府的主导也不是新要素，相反，改革开放前后国有企业的作用和政府的主导在程度上都有所不同，改革开放前，国有企业的支柱性作用和占据的比重更大，政府的主导性在计划经济中更加显著，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新要素是较大程度的经济选择自由、松绑方式的改革、引入了竞争机制、实行了对外开放、民营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后中国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关键就在于上述市场化的改革和经济全球化的开放。这样的客观现实，依然是中国下一步改革的基本逻辑出发点。

二、世界变局中的中美关系

在过去的100多年里，中美关系的定位发生过多次调整：20世纪初美国参与八国联军侵入中国，是标准的敌对关系；随后美国退回部分庚子赔款，用于科学、教育和资助中国学生留学美国；抗日战争前期美国基本支持日本，中后期从财力和军力方面援助中国；抗日战争结束后，美国支持中国内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美直接在朝鲜战争中发生冲突，随后20年中美关系极度恶化；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从破冰到建交，经历了一段政治经济的“蜜月”期、合作期；随后几十年，中美关系在总体向好中波浪式前进。关系的本质内涵是信任和利益，无论哪个层面的关系，信任是根本的前提，没有信任，就无法形成良好的关系，利益再大也不可能产生友谊和爱。中国对世界和平与稳定作出了巨大贡献，进行了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全球化开放，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奠定了中美两国信任的基础，双方均从合作中获得了巨大利益。改革开放后，特别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国力巨幅上升，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随着中国的跨越发展，在一些领域形成对美国的赶超，美国质疑中国的战略意图，对中国的竞争能力感到恐慌。

大国之间的竞争就是资源、制度、人才、技术和话语权的竞争，归根结底就是国力的竞争。但中美竞争中，中国在很多方面与美国仍有很大差距。然而，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对中国产生误判和恐惧。2017年12月18日美国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随后发布的《国防战略报告》，将中国界定为“战略竞争对手”和“对美国产生威胁的国家”。^②2018年10月4日美国副总统彭斯从

^① 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33页。

^② 报告所采用的词汇是 rival，而不是 competitor。参见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n，<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

南海、中国台湾、中美贸易、海外投资等方面对中国进行全方位的指责，随后一个月内又连续发表两次类似的讲话。这已抛离了2011年达成的“中美致力于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①的共识。彭斯的讲话几乎意味着中美关系的彻底转向，也是全球经济局势的一个分水岭。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的《确保信息通信技术与服务供应链安全》行政命令，更表明针对的是“外国对手”，虽然没有具体点出任何国家，但已清楚显示美国要采取的行动。除此之外，美国国会、军方、媒体、学者、企业、非政府机构等也将中国视为“对手”，较折中的观点已被边缘化。

与这一系列定位对应的是，美国利用抬高关税壁垒的手段对中国发起贸易战，并对中国的高新技术企业，特别是信息通信企业（如华为）采取定点“打击”遏制行动。尽管在美国国内高科技企业的反对声浪和中国的反击之下有所缓和，但基本态势并没有改变。与此同时，美国在WTO等诸多国际场合对中国发起攻击，极力否定中国市场经济国家地位，试图形成反中统一战线，联合同盟国家孤立封堵中国，其目的是阻止中国发展壮大，或使中国经济萎缩，或逼中国退回封闭状态，无法分享世界文明进步的成果。

当今世界已经是一个高度融合、产业链社会化生产、国际分工合作的经济共同体，超越了国家边界，核心技术日新月异。如果中美关系继续恶化，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中美两国是否会掉入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相互冲突的“修昔底德陷阱”？从历史看，对“修昔底德陷阱”的跨越，导致了两种特别形式，一种只是经济方面的竞争，另外一种是全方位的敌对竞争，即除了经济方面的竞争，还有制度、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竞争。目前中国与美国的竞争，笔者认为正好处于中间状态，一旦滑向后者，对双方、对世界都将带来巨大损失。

美国的目标已不是巨额贸易逆差，中国也非其他小规模经济体可比拟，中美两国的经济对抗很可能持续、扩大、深入。2019年5月20日OECD秘书长Gurria在接受CNBC采访时认为，中美经济贸易摩擦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很大，鉴于全球贸易紧张局势已经对经济复苏造成拖累，并将继续威胁投资和增长，OECD将2019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自2018年预估的3.9%下调至3.1%。^②美国商务部2019年8月29日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美国实际GDP按年率计算增长2%，较第一季度下滑1.1个百分点，也低于商务部此前公布的首次预估值0.1个百分点。^③在世界经济高度融合的背景之下，再强调美国优先，也无法阻止贸易保护主义对美国经济带来的负面冲击。

中国整体经济也呈现下行的趋势。2019年4月开始，中国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涨幅、出厂价格涨幅同比持续下滑，分别在6月和7月转为负值。^④2019年1—9月以来，除了3月和4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均位于50%以下，^⑤1—7月全国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2.8万亿元，同比增长8.3%，较上半年回落0.1个百分点。其中，7月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7.6%，较6月放缓2.2个百分点。^⑥投资的态势也与消费类似，1—7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348892亿元，同比增长5.7%，较上半年回落0.1个百分点。^⑦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的失业率有大幅度上升的趋势，中美贸易战加速了外资撤离中国的步伐，民营企业的经营也面临较大困境，“稳就业”已成为当务之急，中央要求地方政府解决就业问题，避免出现大面积失业。

值得警惕的是，如果中美经贸摩擦持续蔓延，对中国不利、对美国也不利。

第一，中美产业链脱钩导致大量产业转移到中国台湾、东南亚地区。过去，美国的贸易逆差来源

① 中美两国2011年1月19日在华盛顿发表的联合声明。

② “US-China Trade Uncertainty is ‘the Enemy of Growth’, OECD Warns as it Slashes Forecasts,” <http://www.cnbc.com>.

③ “美国第二季度经济增速下修至2%,” 新华网,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9-08/30/c_1124939062.htm.

④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909/t20190910_1696866.html.

⑤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909/t20190930_1700716.html.

⑥ 数据来源于中国新闻网, <http://finance.chinanews.com/cj/2019/08-14/8926799.shtml>.

⑦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 http://www.stats.gov.cn/tjsj/sjjd/201908/t20190814_1691162.html.

主要是日本、亚洲“四小龙”和“四小虎”，随着中国2001年加入WTO、融入世界产业链和贸易圈，逆差来源逐渐聚集到中国。中美产业链脱钩使很多产业向其他发展中国家转移，给中国带来巨大的资本流失和就业压力。而且，一旦转移成趋势，中国会产生更大的失业问题，而失业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稳定问题。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6月20日，越南外国投资商的新批、增资及出资购买股份总额达184.7亿美元，相当于2018年同期的90.8%，同比增长98%。^①美国货物进口也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对中国的货物进口增长已经为负，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和落差，将影响中美的中长期发展。对美国而言，关税也导致其早前减税的效果大大减弱，并且关税带来的产业链转移、重构的巨大初始成本大幅提高了美国人民的生活成本。

第二，大国之间的具体竞争大多在技术方面，技术交流的减少，使中美双方面临不同压力。中国在对外开放中向发达国家学习，通过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派遣和引进海外留学生、与世界一流大学开展研究合作等方式引进消化吸收了大量国外先进科技。这是后发国家在经济赶超过程中的常用方法，中国也为此付出了高额的“学费”。此次美国加强对中国在科技、教育等方面的封锁，可能会使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下降。客观而言，与中国相比，美国在科技、教育以及军事等方面还保持绝对优势，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是中国学习追赶的对象。一旦封锁被执行，有可能会使中国失去可供学习、模仿的对象，增加学习成本。当然，中国过往的“两弹一星”以及华为公司等实践也表明，独立自主的创新、高压强的研发投入也会带来科技水平的跃升，乃至在部分领域的不对称领先优势。不过，放眼世界经济一体化、产业链高度融合的大背景，不宜强调完全独立于国际通行标准之外的封闭式创新。这同样也适用于美国，如果美国处处动用禁售等不公平竞争手段打压其他国家的科技企业，为了规避风险，其他国家则会形成创新和制定标准的联盟。

第三，随着共同利益的逐渐减少，中美双方的战略互信可能也会减少。从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角度出发，考虑到最大风险的可避性以及小概率事件的发生，可能会引发很大的问题。目前而言，中美双方主要还是在经济贸易领域处于胶着状态，但也有向其他领域扩散的迹象，包括中国台湾问题、南海问题、香港问题、西藏问题等。美国国务院个别官员将与中国的关系界定为“文明冲突”和“一场不同文明和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这种危险的思维方式尽管受到了各界的批评，但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见恐怕不会轻易扭转。在新的形势下，双方在经济领域无论能否达成双赢协议，中国都有可能面临更加复杂的局势。当然，不少有识之士包括许多美国的政治人物、专家学者也从这场贸易战中看到了美国软实力的消亡、传统外交遗产的侵蚀、国际信誉的下滑，主张中美应该走向对话而不是对抗，走向相互开放而不是相互封闭。

三、新时期的中国改革开放战略

伴随着中美战略关系冲突性和对抗性趋势的增强，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面临的不确定性显著增加，这对中美两国和世界经济而言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阻碍因素。中国国务院2019年6月2日发布的《关于中美经贸磋商的中方立场》白皮书指出，通过改革开放发展壮大自己，是应对经贸摩擦的根本之道。对于这一基本结论，笔者完全同意，为应对中美贸易摩擦，要以保持战略定力和冷静最为重要，互信互利最为基础，做好自己的事最为根本，加大改革开放力度以此发展壮大自己最为关键。

时至今日，改革进入深水区，加之中美博弈，世界局势和国内形势变得异常复杂。笔者认为，与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和加入WTO的2001年类似，在当前情境之下扩大开放倒逼改革深化是关键。

^① 《2019年上半年外国投资商出资购买股份总额同比增长98%》，越南人民报网站，<https://cn.nhandan.org.vn/economic/item/7095201-201998.html>。

当然，改革一定要坚持“三个有利于”：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样的改革才称得上是一个好的改革。并且，内外政策的一致性也很重要。如果没有真正意义上更大力度的改革、更大力度的开放，问题将会越来越严重，我们需要以更大的决心、更大的智慧、更大的定力进行更深层次的改革开放。

笔者一直主张，中国的改革和开放要加上定语，应该是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全球化开放，以统一开放、竞争有序为导向，建立和完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才有可能与其他国家形成互信互利的良好关系。并且，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全球化开放相辅相成，开放倒逼改革，改革推动开放。进入新时期，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创造公平竞争营商环境等正成为开放体系下全球经济贸易和投资的目标和重点。短期内实现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困难重重，但应作为努力的方向，从更加长期的角度、以开放倒逼改革的角度去权衡和考量。

当前世界形势和格局异常错综复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更需要坚持走改革开放的道路。改革需要一定的压力和动力，而开放可以形成压力和动力。由于各种原因，国内环境可能无法给出足够的动力，但在国际环境的催化作用下，将会推进中国进一步市场化的改革和经济全球化的开放。比如，规模经济的基本固定成本极大，而边际成本很小，如果国家承担研发这类固定成本，政府扶植的企业参与国际竞争，那么，对市场主导的企业就无公平性可言，处于弱势地位。在公平竞争的市场化环境中，政府不应该是一个事事有为的政府，而应该是一个有能、有为、有效、有爱的有限政府。从根本上来说，为了解决中国内部的问题，要让市场在资源的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政府发挥更好的而不是更多的作用。

由此笔者认为，解决外部的危机和挑战，关键是要进行深层次的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全球化开放。^① 具体的措施包括以下几条：

第一，形成更广泛的自由贸易统一战线，加快推进中欧、中英、中日韩、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等主要多边、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或升级谈判，积极探讨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可行性。避免中国在新一轮格局调整中被孤立于世界经济贸易体制之外。在此过程中，中国也要对WTO发出自己的声音，形成支持多边主义、自由贸易的统一战线，增加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努力实现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只有这样，才能通过国际经济利益的再调整，形成新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在重新制定全球贸易规则的过程中充分保障自身利益。

与此同时，应尽量避免将中美经贸摩擦扩散到以意识形态作为典型特征的冷战中，这将不利于中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合作发展。我们不仅仅要与非洲国家以及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国家建立联系，更要衔接西方国家以及其他发达国家，形成更广泛的统一战线。这是中国革命取得成功以及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法宝，需要继续坚持和运用。历史的经验表明，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同样离不开中国。中国需要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寻找不同国家利益的交汇点，凝聚不同文明价值的最大公约数，构建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开放型世界经济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第二，倒逼市场化改革深化和营商环境优化，以竞争中性、所有制中立的原则进行体制性、结构性改革，形成国企、民企、外企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真正发挥决定性作用。应减少国有企业的政策优惠，让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保持平等地位，通过公平的市场竞争机制改变国企在资源配置上的扭曲状态。要说明的是，竞争中性、所有制中立不是不需要国企，关系民生、国家安全稳定、提供公共物品的行业，需要国有企业，因为这不单单是经济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安全问题。在其他竞争类型的行业中，应坚持竞争中性原则。

依循这样的方向，才能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真正发挥决定性作用，让政府发挥更好而不是更多

^① 相关建议措施在笔者主持撰写的2019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年中报告《外部压力下的中国经济——风险评估、政策模拟及其治理》中亦有详细阐述。参见《内部结构失调仍是中国经济主要矛盾》，《中国经济时报》2019年7月8日。

作用。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成功,原因在于外资企业进入后的鲶鱼效应和示范效应,在于民营企业的大发展、大繁荣,在于国有企业的产权和公司治理改革,总体上有赖于国企、民企、外企共同发挥的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这有赖于建立和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只有这样才能给各类企业提供自主经营、公平竞争的良好营商环境,才能实现商品、要素、资源的自由流动与平等交换,才能为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的微观经济基础。

第三,不断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尤其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体系,加强开放背景下的科学技术与教育的合作交流,促进科学精神、人文精神与企业家精神的互动,助推中国经济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基础研究主要靠政府,但科学技术的创新、商业模式的创新主要靠民企,因为技术创新的成功率不到5%。^①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最具有创新能力的企业,都是民营企业。创新形成的阶段性“垄断”及其竞争压力下的持续创新不同于靠行政性重组形成的不具有公平性和持续性的市场垄断,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结果。不论是从发展和效率的角度看,还是从稳定的角度看,改革、发展、稳定、创新、治理应是五位一体的。

创新需要完善的产权保护制度尤其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中国经济在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必须不断健全和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赋予科研机构 and 研究人员更大的自主权,这样才能真正提高效率,激发、激活创新力。与此同时,中国还需要加强科技和教育领域的国际交流,特别是与发达国家的交流合作,而针对后发国家的教育扶贫在当前不应成为中国国际教育交流的重点。高等院校是孕育和培养科学精神、人文精神的场所,应该进一步全面深化教育改革,实现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的衔接,着力培养真正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和批判性思维的创新型人才,使其在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过程中形成企业家精神,创造更大的社会财富和福利。

结 语

无论是从内部发展需要,还是从外部竞争来讲,中国都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中国经济要在未来30年实现新时期“三步走”的宏伟发展目标,实现更高质量的良性、平衡、充分发展,必须戒骄戒躁、求真务实,尤其在面对和处理中美经济贸易摩擦的问题上要有战略定力、冷静思考、有效沟通,摒弃冷战式的思维方式和话语体系,避免意识形态化和滑向全面冷战式的对抗。应当对中国的客观现实有清醒的认识,不能盲目乐观,应寻求与能力一致、匹配的对外战略目标,不能模糊化和无限化,引起国外的担忧、疑虑甚至恐惧。面对国内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应抓住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找准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和切入点,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层面实施更大力度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体制性改革。通过根本性的制度变革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特别是在一些竞争性行业,起决定性作用,更好而不是更多地发挥政府作用,发挥社会自组织在诸多公共事务中的桥梁纽带作用。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推动中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国家的长治久安。^②

责任编辑:孙中博

^① 田国强、陈旭东《中国经济新阶段的发展驱动转型与制度治理建设》,《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5年第5期。

^② 田国强,《中国须以结构性改革应对经济复杂局面》,《中国经济时报》2018年12月31日。